

華章大历史

灰色生存

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与权力博弈

宗承灏 著



揭开历史深处的秘密 破解权力游戏的玄机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灰色生存

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与权力博弈

宗承灏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灰色生存/宗承灏著. -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229-04378-0

I. ①灰… II. ①宗…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 IV. 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2261 号

灰色生存

HUISE SHENGCUN

宗承灏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马占国

特约编辑: 舒晓云

责任印制: 杨宁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bjhztr@vip.163.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4 字数: 230千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破解权力游戏的玄机

“灰色收入”是近年来一个热词。对灰色收入这个词，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从字面上解读，它是一个用来描述不正当收入的词语，是一个比较温和、比较中性的词。也正是这种貌似温和的心理暗示，往往会让我们失去价值判断。

当所有人都把眼睛盯在那个果上面，往往会忽略事物形成的因，也就是“灰色收入”背后的“灰色生存”。

中国人喜欢大红大绿，不喜欢黑和灰，好像这两种颜色真有些怕见光或者见不得光的意思在里面。“灰色”其实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状态，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生存之道。如果一语概之，灰色生存就是游离在合法与非法边缘的一种状态，它利用传统的熟人社会，游走于法律边缘，使社会规则模糊混沌，以便从中取利。

灰色生存的产生是因为权力机制的不完善，比如利用权力寻租、徇私舞弊、监管不严都会引发灰色生存的连锁反应。当一个人的生存空间遭挤压、排挤、威慑时，人就会自然而然地退守到本就无法逃遁的中性区域，这个区域通常是我们道德的灰色地带。而深陷其中的人也由此陷入了阴阳交错、善恶纠缠、人格分裂的无奈挣扎之中。

中国历史从人情社会到丛林社会的溃败，出现过道德滑坡、社会失范的非常时期。吴思先生提炼出的“潜规则”概念，之所以风行，是因为它为人们揭示了中国历史生存发展的基因图谱。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凡事在显规则之外还有一套潜规则，习惯用灰色规则去勾兑另一条生存管道，如果没有这条管道，内心反而会产生不安。

这种不安来源于我们心底的困惑，追根溯源，这种困惑更多地来自内

心无法抹平的欲望。而在历史的每一个片段和章节里，我们会发现处处都横亘着这样的欲望沟壑，到处都排列着人性的缓冲区域与不断延伸的过渡地带。在权力格局中，甚至是在男女关系与经济收入上，都有这种黑白相间、明暗不定的灰色地带。官场中的和光同尘，经济上的灰色收入，乃至为人处世的中庸之道，无一不是人类生存的努力争斗与无奈妥协握手言欢的结果。如果说灰色生存已成为权力运作的一种润滑剂，那么与历史擦肩而过的每个人都处于一种边界模糊的状态中。按照生存法则，通常情况下距离权力越近的人，其灰色生存的几率也就越大。很多人的大部分精力，可以说都用在了适应和探寻这种颜色之中。

对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灰色生存让他们陷入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困境。一方面他们会为此感到烦恼与焦躁，这种情绪让自己处于危险的边缘；另一方面他们又呼吸于此，否则便会有缺氧的感觉，丧失了生存的空间。因此，人们一方面想要拨云见日，想要分辨黑白；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制造着灰色，以便让自己能够从中渔利。正因如此，也有人认为，灰色是符合中庸之道的色彩，它维系着权力结构的稳定。我将此比作“泥潭理论”，陷入泥潭之中的人，虽然泥沼裹足，而且面临进一步陷落的危险，却很少有人有勇气走出困境。

说到底，灰色生存产生的根源在于权力分配的不规范，如果权力分配规范得很清楚、很透明，构成一个值得信赖的体系，它就像一个支点，能够撬动社会的其他部分，使之保持平衡。灰色生存的支点取决于公权力，如果公权力本身可以昂首世间，它就会产生辐射作用，撬动这个社会的规则，那么灰色将无所遁形。

在一个相对清明的社会中，权力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是用来维护社会公平、化解社会矛盾的一种手段，它要让社会变得黑白分明。而在一个相对灰色的社会中，权力则成为特权阶层牟利的工具，通过干预资源配置、财富生产和分配，以权谋私，中饱私囊，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公。也就是说，社会越灰色，灰色生存的现象也就越发突出，社会矛盾就越激烈。

宗承灏

2011年8月

序 破解权力游戏的玄机

上辑 灰色生存的土壤

- 另一套生存系统 /2
- 食权者的猎食方式 /17
- 看得见的灰色章程 /37
- 权力的第三种模式 /51
- 来自民间的权力控 /64
- 财富的“灰色胎记” /79

下辑 灰色生存的博弈

- 皇帝与臣子的两套算计 /100
- 难言的第四种博弈 /119
- 施暴者的血酬 /131
- 神灵的“灰色基因” /147
- 黑社会是怎样炼成的 /158
- 民与“盗”的转换 /177
- 小白菜的“失语症” /191
- 曾国藩的权力密码 /200

附录一 明清官职一览表 /209

附录二 明清官员俸禄一览表 /214

灰色生存



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与权力博弈

上辑 灰色生存的土壤

另一套生存系统

古代的权力结构中，尤其是地方的官府衙门里，官吏存在着很多获取灰色收入的管道。而在他们获取灰色收入的过程中，并不排除有人会突破尺度，坏了行规，但多数食权者还是会选择一边奉行官家制度，一边又恪守另一套灰色生存的规则，打打制度的擦边球。除非到了一个新王朝的初建阶段，国家机器与政治制度一并打破重建，这种灰色生存系统才失去了生存土壤。而在正常的年份里，就算食权者半明半暗地奉行灰色生存的那一套规则，往往也会被视为一种半合法的行为。

熟人的灰色地带

古代官僚制度是一种相对刚性的制度，它的主要特质就是命令和服从。这种制度所发出的辐射力量通常直接指向各级官员，而官员作为服从者往往处于被动状态。与制度的强大约束力相比，人是具有柔韧性的生命个体，是可塑的、可变的。人在现实和规则面前，就算是铁打的英雄也有弯腰的时候，所以这种被动的服从也就成为官家制度（政府正式的规章制度）的“异化”模式。

在异化了的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很多时候人也就被裹挟着成为刚性制度的一部分，于是有温度的生命个体就可能被制度物化。中国古代官员的灰色生存和官僚制度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系。可以说，权力集团中的灰色生存是官僚制度的一种异化，前者又反过来

推动了后者按照独立的规则运转下去，结果两者相互强化，推动着历史不断向前。

古代官员的灰色生存与权力配置的特点和崇尚权力的政治文化的大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权力配置的特点来看，正式权力的暗箱操作是古代官员灰色生存难以真正被遏制的最主要原因。而所谓的“灰色收入”，也就是由行为人收取的，官家制度不认可其为合法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认定其为违法或非法，但又是违背社会公平公正的、不合理的那部分收入。

灰色收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能确定其来源的合法性，但又无法认定其非法性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将其划到灰色收入的盘子里。比如说逢年过节的官府衙门和各部门福利中，权力集中者所得会比一般官吏来得多，而人情送礼，也是官阶越高、权力越大，节礼就会越丰厚。这是官家制度“敬长尊权”规则下的必然结果。

二是中国古代官场是一个熟人社会，很多事玩来转去最终都要纠结在“人情”二字上面。我们打个比方来说，春节期间，知府家里来了一个亲戚，提了一些很贵重的东西。如果说他单纯的是知府的亲戚，那么这些贵重的东西就应该属于白色收入，是礼品；但是如果亲戚是其所辖地的一名知县，也是做官的，而知府又正好可以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帮助到他，那么亲戚拎上门的礼品就可能转化为灰色收入。灰色收入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与中国自古以来“熟人社会”编织的那一张张复杂庞大的关系网有着密切的联系。

道理很简单，人熟自然形成关系；关系也就是人脉资源，有关系就好办事。如果人不是那么熟，就会逼着你变着法儿地去打通自己的人脉。而打通人脉的过程也就把人置于一种灰色生存的状态之中，这个时候就需要奉上礼金、礼品，依靠糖衣炮弹轰开人与人之间的冰冷状态，把关系搞得熟络一点，为下一步捞取私利做好人情铺垫。就算没有捞到现实利益，最起码不用担心具有“合法伤害权”的人在背后捅你刀子。

熟人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让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私人利益的对接管道，并通过这种管道把人与人联系起来，将各个点连成一条线，最后构成



一张张无所不在的关系网。而灰色收入正是这一张张关系网捕进去的鱼和虾，网越大捕进去大鱼大虾的几率就越高。关系网越织越密，灰色收入也就愈演愈烈，并进而成为深度扭曲的人际关系的一种润滑剂。

换句话说来说，熟人社会所遵循的运行规则，无非就是灰色生存的基本规则。如果每个人都能踢开潜规则，给不给“好处”都一样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谁又愿意无端地去增大自己的交际成本呢？

有人用各种计算公式，推算古代官员灰色收入值，却只能算出一个大概，无法得出一个精确的数字，这不仅是因为灰色收入的隐蔽性，更在于其来源的复杂及界定的困难。要想将其完全量化，难度实在太大，而且这个量又是个变量，并不是定量，这个量因人而变，因时而变，因职位大小而变。

在灰色利益的驱使之下，灰色生存在不知不觉中就转化为官员的基本生活状态。张集馨在他的官场日记《道咸宦海见闻录》中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官场生态：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大宴会每月都有，小应酬则日日不断；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支杂支，总在二百余金。

晚清官员们也就是在这歌舞欢宴和觥筹交错之间，把官家赋予的公权力或者个人对于权力的影响转化为私利的考量，然后他们又将这种考量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脸红耳热的交际场上，那些冷冰冰的白纸黑字条文显得非常不近人情。

话又说回来，那些官员并不能保证其使用的制度条文就能摆平体制内的所有问题。这时候“熟人社会”奉行的那一套准则就会悄然登场，它为权力披上了温情的面纱，赋予了曲径通幽的可能。对于官僚集团成员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和圈子圈套，而并非如何精通儒家经典，学习皇帝颁发的圣谕。他们必须动用人情世故的立体化手段，海陆空全方位地努力，将自己维系在关系网中。

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如果想要在权力场上站稳脚跟，就要动用这些手段。这些手段本身并没有僭越法律，而是介于黑白之间的灰色空间。

而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来说，人情世故也是一门必修的功

课。这门功课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是行走世道所必备的防身术，精通此术方有机会获取权力利益或者降低权力对自己的伤害。

由此可见，灰色生存的意识已经渗透进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空间，并不单单存在于官场。

灰色收入值几何

乾隆五十七年（1792），刚刚从前线击退廓尔喀入侵、平定西藏战乱而凯旋的福康安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在回到京城以后，福康安照例往户部递交了军费账册，以便能够早日报销军费开支，不料却遭遇户部书吏索要“部费”，也就是要赏钱。要知道，福康安从小由乾隆皇帝带在身边长大，皇帝待他如亲生子，这时候的他更是圣眷正隆，是朝廷的大红人。不入官品的户部书吏竟然刮钱刮到他的头上，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

福康安哪里受得了这种勒索，气得暴跳如雷，他怒道：“么麽小胥，敢向大帅索贿赂乎！”论级别，小小书吏与他这个爵爷相差十万八千里。别说刮他的油水，就是他能在人群中瞟上他们一眼，他们也应该激动好几天。

就在福康安愤愤难平之际，书吏对自己的行为给出了解释：索要“部费”只是为了“多添书手、日夜迅办”，如此才能速报速结，否则，“仅就本有之人……非三数年不能了事”。书吏还特意提醒福康安，现在你刚刚大捷归来，皇上对你有求必应，一旦这事久拖不决，“上意倦厌，必干诘责”。这句话是在暗示福康安，要办尽早办，如果拖下去对其不利。

那么，小小的户部书吏怎么敢与皇帝身边的红人、朝廷的封疆大吏叫板？

在中国民间有句老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地方上的胥吏吃老百姓的，而中央六部各衙门的书吏则吃下面大小官员的。所以虾米能不能吃定大鱼，关键不在虾米的才能高低，而在于虾米在权力结构中所处的



位置。这些小小的户部胥吏之所以敢吃定福康安，奥秘就在于官员的隐性利益。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官员的隐性利益。

官员的隐性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灰色收入，二是隐性特权。由于清朝政治制度规范的缺失，当时的大小官员往往会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权，来谋求诸多显著高于社会一般成员的非正当性收益以及依靠权力延伸出来的“含金”收益。

在京城各部门供职的书吏，虽然不能与那些地方官员获取的收益相提并论，可也有获取隐性利益的巨大空间。既然地方官员的“炭敬”（冬天取暖费）、“冰敬”（夏天的消暑费用）之类的贿赂砸不到他们的头上，那么他们就因地制宜，通过自己的部门特权向各地方官员直接索贿。

六部书吏在索贿这件事上是各有各的道儿，从不含糊。在这六部当中，户部索贿是最容易的事，其次才轮得上吏部和兵部。因为户部是管各种费用报销的部门，地方的各项开支要报销，都必须经过户部核准，不然就没办法报。

但凡有利益出没的地方，就会产生灰色生存。那些不谙规则的人，往往就没有办法办成事。

就拿这眼下的军费报销人福康安来说，朝中谁人不晓得他是皇帝面前一等一的大红人？可胥吏照样不买他的账，照样要他按照行业规矩来办事。这时候胥吏的衍生权力，就形成了上自户部大员下到普通胥吏的一条“灰色产业链”。这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之间，是相互贯通的。

送礼是中国古代官场的一种特有现象，并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康熙时期的吏科给事中林起龙就曾经直指要害，他说，一个州县官员到任之后，“参谒上司，则备见面礼；凡遇年节，则备节礼；生辰喜庆，则备贺礼；题授保荐，则备谢礼；升转去任，则备别礼”，一句话就是，新官上任所要烧的三把火，最大的一把火就是权力系统内的人情之火，靠人情之火来融化权力的刚性。

按照中国人所讲究的“节礼”习俗，端午、中秋、新年这三个传统节



日是千万不能漏掉的。尤其是拜年送礼，可谓流毒甚远。

中国传统社会讲究的是人情，所以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我们自然也就很看重这样一个重大节日里的人际交往。其中的拜年被当做一项重要的民俗传统代代相传，早已成为民间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意义上的拜年，大多是一种自觉行为。它的表现形式来自两方面：一是邻里之间的互拜，大家相互串串门、拱拱手，表达喜庆、问候、祝愿；二是晚辈对长辈的伦理之拜，晚辈恭恭敬敬前往长辈处，或施礼或磕上几个头，若晚辈是年轻或年幼者，长辈则还以红包来“压岁”，若晚辈已是成人，就要端出好酒好菜来招待。总之，传统的拜年是分际和讲究的：邻里互拜，抽支香烟尝点瓜果糖之类，实在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可以表现；而伦理之拜，晚辈对长辈施予“礼”，长辈对晚辈还以“利”。

这种以“礼”换“利”的做法，在不知不觉中被移植到了官场之上。

同样是拜年，放在官场上则完全变了味道。首先是大多数的拜年者并不是出于自愿，总感到人家都跑去给上级官员拜年，自己如果搞特殊化，就会被“特殊处理”。时下不是有一个段子说，一领导在某年关曾对一帮部属半开玩笑地说：谁到我家中拜过年我不一定记得，但谁没去我肯定记得。这句话吓得那些本来不准备拜年者改变主意。其次，官场拜年不合传统拜年礼仪，被拜者既收“道贺”又收“钱物”，礼利双收，这完全背离了初衷。所以，官场拜年是“拜年”的异化，拜者借此平台行巴结贿赂领导之能事，被拜者借此机会捞取金钱财物之实惠。

官场拜年的传统自古有之，但这种拜年并不是发乎情而止乎礼，人们往往拜的是权并不是年。明中期的官员陆容在他的《菽园杂记》中说，“京师元旦日，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亲友多出实心。朝官往来，则多泛爱不专……”也就是说，士人与老百姓拜年都是捧着一颗心来，而官员之间的往来，就有花心的成分在里面。为什么花心？当然是为个人命途考虑。

进入清朝中期以后，这种送礼之风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当时，一个省部级高官如总督、巡抚一年的“节礼”收入是不可估量的，其标准也是



因时、因地而异。当时官员的灰色收入和地方经济状况是成正比的，富裕之地可以刮出的地皮油水肯定要比穷乡僻壤更多。

晚清时期，一个省部级地方大员即使在甘肃、云贵这样的穷地方为官，一年捞他个两万两银子也难度不大（当时一两银子约折合人民币 200 元，两万两银子约合 400 万元）；如果在江西这样不算穷也算不得富的地方为官，官员只要稍微动用“灰色技能”就能获取六七万两银子；如果运气好的话，能够分配到江浙地区这样的富裕省份为官，那就等于是抱上了一棵摇钱树，一年从树上摇落个十万雪花银应该是很轻松的一件事。那个时代的十万两银子，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相当于两千多万元。

我曾经在古史堆里翻出下面一组数字，可以以此来算上一笔账：康乾时期的文官集团的总人数在 3 万人左右，如果我们按照每个人每年所捞取的灰色收入是 1000 两银子计算，那么一年下来，用于官员灰色生存的总费用就高达 3000 万两。而乾隆十八年（1753）国家一年的全部收入约 5000 万两白银、1300 万石粮食。两下对比，我们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朝廷官员的“节礼”差不多是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如此惊人的数字，传递出的信息是，清朝官员灰色收入已经不再是“灰”那么简单的事。

还有人推断出，晚清光绪年间官员的灰色收入是其正式收入的 20 倍。数字的精确程度暂且不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官员的灰色收入要远远大于其正式收入（工资）。古代官员的正式收入通常是朝廷付给的劳动报酬，属于正俸。清代文官集团的正式收入在 650 万两银子上下，但灰色收入却达到了 3000 万两（这里也仅仅是放在明处的“节礼”一项）。两下比较来看，差距又是何等惊人。

当古代官员拿着并不丰厚的工资单在哭穷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了那正式收入背后的巨大黑洞。

虾米吃大鱼

福康安作为体制内部的一分子，他不可能不了解这些灰色的弯弯绕。

要想报销款尽快到位，福康安肯定要转变“虾米吃不起大鱼”的观念。如果他只是愤怒，无视潜规则的存在，不给当事人的户部书办“意思意思”，那么来回折腾个两三年也是很正常的事。这里的“意思意思”，并不是随便“意思”。“意思”也有规则运行的标准，那就是按照报销总额的比例来抽取“意思”部分，总额越高，所抽取的“意思”部分也就越大。

福康安在这里要报销的是军费，军费开支应该是所有报销项目中最为庞大的一笔，那么作为户部的经办人相应得到的灰色收入也应该是最为丰厚的。如果官员要报销一百万，起码得拿出五万到十万两银子用于打点、疏通各级胥吏。另外还有发饷、拨款等各个环节，都需要见庙就烧香，见菩萨就磕头。你的礼没有送到，我就拖着不给办，到最后看一看是你急还是我急，反正有的是律例方面的借口，也不怕担责任。

当然这笔钱书吏是不可能独吞的，权力集团的分肥规则不是让一个人吃饱，其他人全饿死。这笔灰色收入，司官、堂官也是见者有份，但捞到大油水的还是具体的经办人员。所以清代户部的大小官员、书吏是六部之中最肥的缺，甚至有人称，户部书吏的富裕程度，并不输给京城里的那些大小王爷们。《清稗类钞》中就有“东富西贵”的说法，因为户部的书吏大多数居住在正阳门东和崇文门外，那里可以算得上当时北京城内的高档住宅区，而司官则大多居住在宣武门外，比自己的下级差了好几个档次。

福康安在这里碰上的就是户部，当然，在当时不光户部这座山头有胥吏如虎，其他各部也都养着吞钱的主。吏部、兵部的书吏也有自己的权力资源，他们吃的是那些想要升迁、补缺的官吏。我们打个比方说，如果外省有一个位置空缺了，在京候补的官员知道信息后，就会马上到吏部或兵部上下打点行贿。书吏根据这个空缺位置带来的利润大小来向其索贿，真正按照官员资历和能力来安排职位的是少之又少。与上面提到的几个部门





比较，工部、礼部、刑部相对来说要清淡一些。这几个部门的官吏要等待朝廷有大工程，或皇族有大婚、大丧、重大礼仪事件，或重大刑事案件发生时，再狠狠地捞上一把。

这一次，户部的虾米准备吃定福康安这条大鱼，小吏要教教福康安怎么做官。按照大清帝国的财务制度，在这里将当时户部的报销过程做简单介绍：

福康安先就自己要求报销的事项进行逐项统计，填写清册，然后再送交到户部，这叫“投文”；户部在接到福康安处递交上来的报销清册后要对各项花费是否符合规定进行审查，所谓的“审查”，也就是看有没有“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核估不实”等“虚开浮估”的情况发生，这个过程类似于我们今天审计部门的审计。

户部如果发现报销清册中有不合规定之处，就会打回去要求福康安重新核实，这叫“批驳”。等一切报销项目都符合规定了，户部要草拟一份准予报销的奏折，交给皇帝审批。皇帝也没有精力来逐条逐项核对账目，另外福康安又是他最为放心的人之一，所以皇帝这里就成了最容易蒙混过去的一关。只要户部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一切都是符合规定的，皇帝没有理由不同意；如果皇帝签字同意报销，户部给福康安一个批文，整个报销流程就算到此结束。

这个过程，和现在一个单位的财务报销流程是一样的，户部就好像我们单位里的财务处，而户部长官（尚书）就如同财务处长，而皇帝就是帝国这个大单位的“一把手”。

从以上报销流程，我们可以看出来，决定福康安报销是否能够顺利通过，关键还在于户部审计那一关，其他环节基本上都是虚的，走走程序而已。但是户部权力的真正体现，除了审计，还有“批驳”。如果户部那些文吏说福康安的报销项目不符合规定，说他有做假账的嫌疑，那么他的报销就要搁置。

户部这么说完全是工作职责所在，它有严格执行财务制度的理由和借口，而且理由是正式权力范畴内的，福康安根本挑不出来任何毛病。但

是，这却是福康安最不愿意看到的。

为了能够顺利报销，避免被批被驳，福康安就不得不准备一笔专门的活动经费，这笔经费就叫做“部费”。这笔经费专门用于“跑部钱进”，以此来打通上下环节。

毕竟，财务工作不是随便就能搞得清的，如果这些书吏想要挑福康安的财务问题，福康安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道不出，说你有问题就有问题，没有也有。也正是因此，这些书吏们才有了吃大户的空间。

小胥吏大买卖

我们知道，财务是一件非常琐碎而复杂的工作，用康熙年间的名臣靳辅的话说，是“数目繁琐，头绪牵杂，非精于核算、洞悉款项、熟知卷案者，万难得其要领”。也就是说，财务工作是一件让人头疼万分的事，不熟悉这项工作的人，根本搞不清楚里面有哪些弯弯绕。

因此，要对送审的报销账目进行审计就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而且为了严肃财务制度，避免在报销中弄虚作假，审计过程要很认真细致。作为一名合格的户部书吏不仅要具备熟练的业务知识，而且审核过程也非常耗神费力。在明清时代，这项工作本来是户部官员的职责，但实际上都是交给被称为“部吏”的户部书吏们去做的。

因此，具体办事人员（胥吏）在具体操作报销事宜时，户部分管工作的官员只需要拢着袖子在一旁等着利益分成就可以了。

按照清朝时期的权力结构设计，京城六部衙门里的胥吏只是一些普通的办事人员，他们的工作无非就是干一些抄抄写写的活，类似于今天政府部门的办公室文员。

在权力的等级制度中，这些文员的上面还有很多人——被称为“司官”的主事（处长）、员外郎（副司长）、郎中（司长），被称为“堂官”的侍郎（副部长）、尚书（正部长）管着他们。可问题是，管归管，那些处长、司长、部长却没有几个懂得财务方面的专业知识。即使有人知道一

